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本书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
新闻出版总署新中国60年百种重点图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IV
改革风云
GAIGE FENGYUN
1976-1990

修订本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4, 改革风云/郭德宏, 王海光, 韩钢
主编. 2 版.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 1(2009. 8 重印)
ISBN 978-7-220-06676-4

I. 中… II. ①郭…②王…③韩…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1949~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1167 号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四)

——改革风云(1976—1990)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主编

策 划	解 伟
责任编辑	周 颖 叶 勇 唐海涛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技术设计	杨 潮
责任校对	叶 勇
责任印制	祝 健 李 进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86259459 86259455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862595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6
插 页	3
字 数	438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220-06676-4
定 价	298.00 元(全五卷)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86259624

目 录

“文革”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恢复	孙大力 (1)
“文革”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新冒进的出现	孙大力 (16)
“两个凡是”的由来及其终结	韩 钢 (29)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沈宝祥 (48)
1978 年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树军 (72)
大规模冤假错案的平反和各项社会关系的调整	王海光 (96)
文艺界的拨乱反正	徐庆全 (130)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国民经济的调整	陈雪薇 (163)
1978—1984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思路的演进	肖冬连 (185)
中国对外开放的决策过程	肖冬连 (214)
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发展	郑有贵 (233)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	于 南 (250)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通过	佟英明 (272)
中共十二大和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纲领的提出	柳建辉 (292)
80 年代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匡家在 盖 军 (304)
80 年代国际战略转变和外交方针的调整	武国友 高秀清 (323)
新时期军队和国防建设的新局面	陈培军 (336)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提出	刘华清 (359)
中共十三大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	陈 述 (370)
1989—1991 年的治理整顿	徐棣华 武 力 (390)

“文革”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正常秩序的恢复

孙大力

揭批“四人帮”和抵制“两个凡是”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立即采取措施，摧毁“四人帮”残余势力，部署和开展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并确定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但为了求得局势的稳定，华国锋采取了对“文化大革命”、包括对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全部继承和维护的做法，并由此提出了“两个凡是”，作为指导中国继续前进的方针。

1976年10月7日至14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在讲到稳定局势时，对揭批“四人帮”划定了框框，作出了限制，认定“四人帮”的实质是极右，粉碎“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此，只能批判“四人帮”的“右”，而不能批“左”，更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涉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他一再要求人们“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还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强调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发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25日，华国锋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发表讲话，部署了揭批“四人帮”的三个战役，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按照这一部署，中央和地方的报刊均辟专版声讨和控

诉“四人帮”的罪行，刊登揭批“四人帮”的文章。随后，“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二》（即“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和《材料之三》（即“四人帮”在各个领域散布的反动谬论）也相继下发。全国上下迅速形成群众性的批判高潮。

不过，当时看似轰轰烈烈的批判运动，实则却被严格限制，处处掣肘，进展艰难。先是被要求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本身，也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继而又规定只能批“极右”，而不要批“左”，因为“四人帮”的实质被认定是“极右”。12月25日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为揭批“四人帮”作了动员，又为揭批“四人帮”定了调子、划了框框。华国锋在讲话中说：“他们（指‘四人帮’）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什么‘左派’，什么‘激进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当揭批“四人帮”运动全面展开后，华国锋又宣布：中央确定，揭批“四人帮”，重点应放在十大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意图很清楚，就是要守住必须肯定“文化大革命”这条界限，因而也不能触动党的九大、十大的错误。

1977年1月，理论界开始要求突破上述限制，提出要对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两篇文章进行点名批判。这两篇文章，是全面阐述“四人帮”的极“左”理论观点和政治纲领的代表作，影响很大，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混乱。可是，当《红旗》杂志就此问题请示中央时，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人汪东兴却批示：不能点名，这两篇文章经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只能不点名地批判文内的错误观点。结果，人们只好在批判形“左”实右的名义下，批判这两篇文章中的一些谬论。

不过，尽管如此，人们对“四人帮”的批判还是在逐步深入，向前发展，并不断地冲破限制。

与此同时，全国对“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开展了普遍的清查，对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坚决予以揭露并进行审查，对各级领导班子逐步进行调整和加强。从1977年1月起，中央陆续对受“四人帮”影响较深、阻碍揭批运动开展的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省的领导班子采取组织措施，任命安平生、任仲夷、宋平、万里等一批同志分别担任这些省的主要领导，有力地推动了各地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和对帮

派体系的清查。对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部门，党中央也进行了调整和加强。1976年10月8日，中共中央成立由耿飆负责的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整个宣传舆论部门。1977年3月3日，中央政治局决定由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主持常务工作的副校长。3月7日，中央决定并发出通知，由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在揭批“四人帮”中，广大干部群众很自然地提出了纠正“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的要求。这种要求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希望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实际是要求否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是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也就是要肯定以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纪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的群众运动。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10月12日，胡耀邦在托人带给华国锋的口信中表达了当时的人心所向：“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三天后，10月16日，李先念就今后的工作征求陈云的意见时，陈云明确提出：对天安门事件要重新审查。

由于华国锋在打招呼会上强调的精神，《人民日报》虽然从10月9日到14日，先后四次出现了“批邓”的版面，但其中的文章和报道都不过是粉碎“四人帮”前积压的稿件。事实上在粉碎“四人帮”后，已极少有人再写“批邓”文章，《人民日报》也未再组织此类稿件，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根本进行不下去了。不仅如此，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还很快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整理成调查材料报送中央，揭露了“四人帮”在事件报道中是如何歪曲事实、颠倒黑白、制造错案的。

然而，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指示：（一）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四）天安门事件避开不说。根据这一指示，11月中旬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也提出要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并规定当前的宣传方针主要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希望把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这方面来。在一段时间里，报纸刊登的批判文章仍继续使用着“文化大革命”时的语言，把“四人帮”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粉碎“四人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等等。同时，对华国锋的颂扬，也出现不少过誉之词，承袭了过去个人崇拜的做法。

但是，广大干部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呼声依然十分强烈地表达着。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后，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的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同时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罪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且对压制群众的某些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强烈批评；晚年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维护“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错误做法，也表示了不满。

这种情况引起了华国锋等人的高度重视，认为中央应当进一步表明态度。1977年1月，中央的写作班子为华国锋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根据他1976年10月对中央宣传口的指示精神，在1月21日写成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这样的提法：“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后来会议推迟召开，决定先发一篇社论，以作准备。于是这份讲话稿在稍做加工后，经汪东兴审定、华国锋批准，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社论，于1977年2月7日公开发表。这篇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正式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史称“两个凡是”）的方针。

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华国锋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会前，他特意向各组召集人打招呼，希望大家发言不要触及邓小平出来工作和天安门事件这样敏感的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正是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会议前夕，陈云、王震、胡耀邦、姚依林等一批老同志商议，一定要在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陈云为此专门准备了书面发言^①。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

“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

^① 《萧劲光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57页。

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①

王震也在会上提议，要邓小平出来工作；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他们的发言讲出了党内外大多数人的呼声，得到不少与会同志的赞同。但由于同“两个凡是”方针相抵触，会议简报组在整理陈云发言时只搞了一个“摘要”，并解释原因是“因为有些话同华主席讲话的口径不一致”。陈云当即表示：“要登就全文登，搞摘要不行。”结果，这篇发言竟然没登简报。其他几个人的发言简报，关于这两个问题的内容也都被删去。尽管如此，陈云等人的发言还是不胫而走。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讲话，比较明确地表述了他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这个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他说：

粉碎“四人帮”后五个多月的情况说明，“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的决策和措施，是正确的。其所以正确，就是继承了毛主席的遗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要通过抓阶级斗争，实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必须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着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的问题，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这就是要高举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大家知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在决定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认为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应当正确地解决，但是要有步骤，要有一个过程。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经过五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问题的条件逐步成熟。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经过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正式决定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问题，在‘四人帮’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时候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毛主席，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今年1月间，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中央作了妥善的安排和处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满意的。但是，有极少数人却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把群众注意力引到天安门事件问题上来，甚至公开点名攻击中央负责同志，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的矛头不对，实际上背离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方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一定要注意，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

华国锋这番话既表明了他的“两个凡是”的主张，又暴露出“两个凡是”本身的错误和自相矛盾：既要结束“文化大革命”，停止“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又要坚持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既要维护毛泽东同意的批邓决策，又不能不同意在适当时机恢复邓小平的领导职务；既要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又不能不承认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总之，逻辑上讲不通，人们的疑问和抵制反而更多了。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鲜明地提出了“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的概念。5月24日，他在同两位同志谈话时，再次明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有力地抵制了“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为此，华国锋只能绕开矛盾，希望通过对毛主席旗帜的维护和宣传来扭转人们的注意力。

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出版发行。第5卷里虽然收入了毛泽东在建国后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的著作，但也有不少带有“左”倾错误内容的文稿。而华国锋于5月1日为第5卷出版发表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一文，却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归结为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央在4月7日发出的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决定中也提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于是，对《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学习和宣传也集中在维护这个理论上。

通过上述方式，不仅增加了“两个凡是”的权威性，使之成为指导性的方针，而且还表明了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华国锋对于今后中国走向所持的态度。

这就是：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继续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不管是揭批“四人帮”，还是平反冤假错案，都只能在这样的框架下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旧要按毛泽东晚年设想的轨道前进。从而给解决广大干部群众提出的迫切要求，给亟待开展的拨乱反正，划定了一个禁区。

邓小平的复出

然而，历史的前进趋势毕竟不可阻挡。尽管“两个凡是”在被极力推行，但还是在党内外遇到了有力的抵制；尽管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要求受到了压制，但人们的要求仍然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在党内外日益强烈的呼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做出了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的决定。而邓小平的复职对于亟待开展的拨乱反正，立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首先通过追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四人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华国锋在会上的讲话中，没有再提“两个凡是”，但仍然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强调粉碎“四人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央的决策和措施都是正确的”。这表明他实际并没有放弃“两个凡是”的方针。

这次全会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邓小平的复职。会议决定全部恢复邓小平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撤销的领导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激起一片欢呼。许多干部和群众纷纷举行集会，表达对中央这一决定的拥护。

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复职后的第一次正式讲话。他首先表示了对党中央粉碎和揭批“四人帮”的决策的拥护，表示了对重新出来工作的心情，他说：“坦率地说，我自己也考虑了一下，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

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然后，他再一次讲了如何正确理解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指出：“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①

接着，他又简要地回顾了毛泽东思想的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倡导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特别指出：“1957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怎样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比如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比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充分发扬民主，比如群众路线、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目前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4页。

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是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①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更明确地提出了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应该具有的正确态度，为人们从“左”倾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树起了实事求是的旗帜，进一步抵制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影响。

鉴于党的十大以来我国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全会批准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建议，并为大会做了必要的准备。

党的十一大和老一辈革命家对实事求是的倡导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0名，全国这时有党员3500多万。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华国锋所作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听取叶剑英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有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成员：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以上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彭冲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是：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还初步总结了揭批“四人帮”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46页。

的斗争，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顺应了人民心愿。但是，他在报告里依然充分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它“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创举而载入史册”，“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并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在讨论十一大的政治报告时，一些同志曾提出意见，力图纠正政治报告中某些坚持“左”倾错误的内容。有的同志主张不要再用“取消资产阶级法权”等提法；有的同志反对提“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指出这种提法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对它要作“三七开”的评价，因此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不合适；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里关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整个”、“始终”的提法不合适，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还在他的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报告定稿时，华国锋没有接受这些意见，从而排除了依靠党的集体智慧纠正一些重大错误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虽然对原来的党章作了一些必要修改，但却没有抛弃“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

这次大会虽然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仍未能承担起当时突出面临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促进历史转折实现这一重要使命。

不过，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革命家已经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他们通过积极宣传党的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推动全党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

8月18日，邓小平在十一大致闭幕词时针对多年来党的优良传统被破坏的情况号召全党：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这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一定要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反对华而不实和任何的虚夸，少说空话，多做工作，扎扎实实，埋头苦干。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党内和整个人民内部，认真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全军、全国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①。

9月5日，聂荣臻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一文，结合党的历史阐明：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毛主席同党内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长期斗争中，特别是同王明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是在同各种主观主义、特别是同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就要坚持用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词句当作脱离时间、地点和条件的教条。我们的一切正确思想，归根结底，只能从实践中来，从实际经验中来，并且必须回到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经验的检验。

9月19日，徐向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永远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文章，通过回顾党同张国焘、林彪、“四人帮”在军队问题上斗争的历史，着重提出：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首要的是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决不能不管路线是非，谁的权力大就跟谁跑。为此，就必须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分清路线是非的能力。

9月28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学风》一文，从思想路线的高度论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必要性，指出：实事求是，这不

^① 《人民日报》1977年8月25日。

是一个普通的作风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思想路线问题。我们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离开了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那么，我们就离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成为脱离实际的唯心主义者，那么，我们的革命工作就要陷于失败。所以，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实际上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

10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集中到一点，就是有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他要求党的干部都要用心研究我们党的历史，总结党的经验和失败教训，要把被歪曲的历史重新纠正过来。

这些文章和讲话进一步启发了人们摆脱“两个凡是”束缚，按照实事求是的要求去思考问题，澄清“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思想混乱，进而推动了各个领域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

各项工作步入正轨

十一大以后，党、军队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构通过整顿进一步得到健全和加强。

1977年8月23日，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提出，军队要把教育和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验干部、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要从教育训练着手。一方面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另一方面要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把军队原有的学校基本上恢复起来，要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要恢复我军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公布了第十一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名单：华国锋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8月29日，中共中央任命韦国清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

决定》等文件。叶剑英在会上讲话，强调部队要抓好十项任务：（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四）加强党的建设；（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六）加速装备现代化；（七）搞好精简整编；（八）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九）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邓小平在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要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使我们的干部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使我们的战士成为一兵多能的战士。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各部队开始把培养“两用人才”（即军队和地方都合用）作为军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为新形势下的军队建设，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积极影响。同时，各类军队院校也陆续恢复，并开始在军队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省、市、自治区从1977年10月起相继召开新的一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领导。与此同时，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中，也陆续恢复建立党委或党组。新产生的各级领导班子中，注意了清除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并起用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使党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得到充实和加强。

同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一样，鉴于国家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提前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权组织进行调整和更新也势在必行。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从1977年11月起，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新一届领导人。

1978年2月26日到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456人。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聂荣臻、刘伯承、乌兰夫、吴德、韦国清、陈云、郭沫若、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邓颖超、赛福鼎·艾则孜、廖承志、姬鹏飞、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大会决定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为副总理；确定了国务院其他组成人选。同四届人大相比，这一届人大常委和国务院领导成员中，通过“文化大革命”涌现的造反派代表人物基本没有了，那些不能胜任领导工作的劳动模范代表也大都退出，一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了国家领导岗